

王拥军：十年“冷板凳”，咬着牙做“卓越的医生”

● 本报记者 陈祎琪 张思玮

2月11日上午9点，刚刚领完“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的王拥军又出现在2025年度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会议现场。

“一忙就忘记倒时差了，昨晚回到家才感觉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说。

作为该奖项设立34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王拥军在颁奖仪式三周前通过邮件收到了获奖的消息，当时既激动又意外。激动的是几十年的临床科研工作终于得到了认可，梦想一步步走向现实；意外的是，这一业内最高殊荣来得有些突然，但也代表着国际卒中临床研究从此有了中国的声音。

而当真正站到领奖台上，被盛大的仪式感所包围，他感受更多的却是“责任”。“这个奖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还包括我的团队，以及中国2400多家医院。它背后承载的是中国2400多家医院未来的责任。”

从1982年毕业步入临床工作，到2025年斩获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最高奖，这一路王拥军如何成长为“卓越的医生”？对此，他引用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纪录片《盛会》中的一句话：“一切的宏大始于原点。”

每年减少124万人卒中复发

王拥军表示，在脑血管病治疗上，他见证了发展的两个阶段。

1982—1992年是经验医学阶段。那时王拥军大学刚毕业，临床上对缺血性卒中的治疗方案就是扩血管加抗凝治疗。“那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是靠天，医生的帮助是有限的，我经历过那种无助。”

1992年，循证医学时代到来。“有了循证依据，我们医务人员就知道能为患者提供多大帮助、患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未来还有哪些风险，就有了治疗的信心、标准、方向和正确的选择。”王拥军说。

在循证依据支持下，王拥军团队的CHANCE研究通过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将全世界卒中患者三个月内的复发率从11.7%降至8.2%。

“现在经过CHANCE-2、CHANCE-3



王拥军（前排中）和CHANCE研究团队合影。

受访者供图

的系列研究，卒中患者三个月内的复发率已经降到了6%，相当于全国每年复发的人数减少了124万人。我们期待再用三五年时间将复发率降到4%，最终目标是2%，相当于健康人的发病概率。”王拥军说。

此外，溶栓治疗出现后，当前的卒中致残率已经降到了1/3以下，也就是说2/3的患者可以重新回归社会，享受有质量的生活。而在静脉溶栓时间窗上，王拥军团队的TRACE-3研究将其从传统的4.5小时延长至24小时。这意味着90%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都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进一步提升了诊疗效果。

“目前，天坛医院在2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卒中患者的急救治疗，最快的只需7分钟，这就是循证医学的力量。在此之前，国内卒中救治平均需要60分钟。”王拥军说。

从“听不懂”到站在国际舞台中央

2002年，王拥军第一次参加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时，“在现场根本听不懂别人讲的循证医学，急得不行”。然而2013年，当他再次前往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时，他不仅成为循证医学坚定的追随者、践行者，而且第一次站在国际讲台上发布了研究成果。

今年，他在国际卒中大会上获得了“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从“听不懂”的观众到站在舞台中央的“明星”，王拥军用了20余年，这也是中国在卒中领域一步步走向世界的缩影。

“为什么一定要做研究？就是为了让患者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所谓高质量医疗，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病人以

正确的方式给予正确的治疗。这不仅仅是哪家医院服务态度好、病房住得舒服的问题，而是是否可以让患者得到最好的医疗安全保障以及预后理想的生活质量。”王拥军说。

21世纪初，王拥军便通过承接国外研究项目逐步学习。然后，他带领团队进入“练兵”模式。先从简单的队列研究入手，后在“十一五”期间承担了中国国家卒中登记库项目。“当时接这个任务时，中国重大新药创制的药厂和基础医学科学家们有一个共识，临床研究是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瓶颈。所以回来我们就开始设计CHANCE研究。”

从2001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从基础做起，布局未来。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产出。王拥军坦言：“别说全国的压力，就是院内的压力都让你喘不过气来。”面对误解、质疑甚至指责，学生都感到委屈，王拥军却从不争辩。“我们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难被理解，好在当时戴院长和后来的王晨院长很支持我们，团队也都憋着一股劲。如果逞一时口舌之快，破坏了研究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不成了。”

2011年，王拥军团队在卒中领域权威期刊《Stroke》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2013年，CHANCE研究成果首次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此打开了团队科研的新局面。

“做科研就跟做建筑一样，‘打地基’的过程很多人都耐不住。10年‘冷板凳’，我也灰心过、想放弃过，我也想干吗不对付一下，但是责任和团队的期待让我无法这么做。”王拥军说，纵观国际上成熟的临床研究团队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如果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这种煎熬就必须承受。

目前，王拥军团队是全世界单中心在《Stroke》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团队，每年超过10篇。《Stroke》主编Marc Fisher曾和王拥军说：“一架大型飞机要想顺利起飞，跑道一定要足够长，驾驶员一定要足够有耐心，这样才能确保飞机在腾飞时一下就能冲上天。”

必须咬着牙做“卓越的医生”

临床研究之外，王拥军坚持每周出门诊，深入临床一线。“优秀的医生救治的是一个患者，而卓越的医生救治的是整个群体，是千千万万的人。”王拥军说，“但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如果人人都满足于优秀，就没有创新，医学的发展就只能原地踏步。”

对王拥军而言，在成为“卓越的医生”的路上，他感恩于三个重要的引路人。第一位是他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时的神经科主任司志国，帮他选择了正确的临床方向。“我的英文也是科主任带着练出来的，他每个月让我交一篇论文的翻译，只要晚交一天就会在全科会上当众批评。曾经因为我病历没写好，他把我的病历从窗户直接扔到外边的草坪，我流着眼泪去捡病历。但是我一辈子感谢他。”

第二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孟家眉，真正改变了王拥军做科研的战略布局。“在我心中，孟主任算得上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在认识他之前，我关注一个个病人，认识他之后，我开始把精力转向预防，转向科学研究。”

第三位是他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McGhee，教会他如何“敞开大门”做科研、合作做科研。“我去报到时，他就给了我一把万能钥匙，告诉我这把钥匙能打开每个实验室的门。他说，‘单一的实验室不可能什么设备都有，有了这把钥匙，我需要用哪个实验室，直接打开就可以。’这对我触动很大。”

现在，王拥军成为了很多青年医生的指路人。“天坛医院搬到新址后，我在院内也推出了‘北京天坛医院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美国医师科学家占美国医生总数的5%，我也希望在天坛医院，有5%的医生未来能承担起医师科学家的责任。”

（下转第8版）